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理论与方法

(下)

杨 耕 吴向东◎主编

SHEHUIZHUYI HEXIN JIAZHIGUAN
LILUN YU FANGFA



四川人民出版社

杨 耕 吴向东◎主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理论与方法

(下)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与方法：全三册 / 杨耕，吴向东主编.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220-09949-6

I. ①社… II. ①杨… ②吴…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论—研究—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4420 号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6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SHEHUIZHUYI HEXIN JIAZHIGUAN : LILUN YU FANGFA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与方法（下）

杨 耕 吴向东 主编

选题策划
执行组稿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内文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黄立新 周 颖
章 涛
章 涛
四川胜翔
戴雨虹
蓝 海
李 剑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65mm×240mm
53.25
682 千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9949-6
480.00 元（全三册）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冯 平 汪行福 王金林 孙向晨 徐洪兴 邓安庆

“复杂现代性”框架下的核心价值观建构

世纪之交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莫过于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前者被自由主义思想家视为两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话语霸权之争的了结，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①而后者表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和西方霸权体系的动摇。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对此，中国思想界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论。争论聚焦于对中国现实问题起因的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价值判断，和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究。^②这些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分析、判断和见解，与严峻的现实交相呼应，呈现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与解决这些问题的艰巨性。在中国发展的这一历史时刻，我们需要厘清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重构现代性理念，以中国当下活着的传统为基础，构建规范中国社会发展的核

① 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强调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方式”。（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参见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心价值，以此凝聚社会共识，激发深化改革的力量。

一、中国的历史坐标和未来发展的难题

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这三大张力之中。这三大张力标示出当下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历史坐标，彰显出确立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所面临的三大难题。本质主义的、单一化的现代性理念，以及极有可能堕入相对主义的多元现代性理念，都无法使我们解决这三大难题。我们需要建立“复杂现代性”理念，并以此作为分析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探寻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方法论原则。同时需要建立与“复杂现代性”相应的思维方式，以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三大传统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

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我们把握当代中国的第一个坐标。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首要难题。其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在经验层面是否可能有自己的做法，不同的民族国家是否可能有实现现代化的不同方式；而在于：现代化这一历史变迁中是否蕴含着一组普遍价值，是否蕴含着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昭示历史发展趋势的总体特征，一个国家能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全或保留自己的传统；一个现代化国家能否既具有现代化的总体特征，又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从而在现代化的全球化过程中，保留一种文化的多样性和提供一种发展的可能性；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否走出下述非此即彼的“误区”：要么是“绝对主义”地强调全球只有西方现代化一种模式，要么是“相对主义”地认定各民族各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可通约的。这是探究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而必须考虑的第一大难题。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我们把握当代中国的第二个

坐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两种筹划，是现代历史中展开的现代性的两个版本。问题在于，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它们各自在现代性中把握到了什么，在其各自的理念和所追求的价值中包含着什么样的理性和解放潜能，它们各自具有什么样的有限性？在它们的历史展开中又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探究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而必须考虑的第二大难题。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趋势问题，是我们把握当代中国的第三个坐标。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必然选择，还是特定历史力量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崛起是否包含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行动逻辑的出现？在现代性的话语框架中，是否可能存在一个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样态？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更应是一种种族的、疆域的认同，还是更应是一种共同体生存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这是探究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而必须考虑的第三大难题。

处于三大张力中的今日之中国，是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希望的中国，也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的中国。其希望在于，中国开始于1978年的社会主义改革经历了三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已经打破了致使苏共败亡的“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对经济利益的垄断”和“对真理的垄断”，^①打破了东西方冷战思维模式，已经融入了世界文明的发展洪流，已经坚定地走上了以富强、自由、民主、法治为取向的现代文明国家建设之路。改革开放带给中国人民的不仅是物质的巨大丰富、国家的强盛，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改革开放向中国人打开了世界文明的大门，从思维方

①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认为，苏共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参见李凌《究竟是何种制度性因素导致苏共垮台？》，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下），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7—1203页。



式、价值观念等各个层面培育着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建设者。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已展现出现有模式所存在的严峻困难和问题，突破艰难险阻进一步深化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现有的基础上，究竟应该确立何种价值？究竟能够确立何种价值？

二、“复杂现代性”

上述三大张力，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当下境况，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要真正掌握中国的命运，就必须从本质上把握这三大张力。就其本质而言，这三大张力都是现代性问题的不同呈现样式。三大张力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现代性问题。三大张力的核心在于现代性，即在于中国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理念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我们认为，只有以“复杂现代性”概念才能比较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当下之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弄清楚当代中国需要一套什么样的既立意高远具有感召力又脚踏实地具有可行性的核心价值。

当代中国的希望与困难都昭示着，中国正处于“现代性转型”，即一个“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之中。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我们在尚未完成现代化之时，已经遭遇了思想家对现代性的强烈批判，尚未实现现代化的解放潜能，已经看到、甚至经历了现代化的种种弊端。这一境遇使我们在确立未来发展方向时腹背受敌、左右为难、进退失据。面对这一艰难情境，我们认为，需要建立“复杂现代性”的理念，并以此作为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框架和探寻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方法论原则。

“现代性”（modernity）就其外延而言，是相对确定的。它特指那些发端于西方启蒙运动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这些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在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孕育、丰富，并对这一过程发挥着规范作用。但是，就“现代性”的内涵和对现代性的价值判断而

言，西方思想家们的见解却有很大分歧。按照齐默曼的见解，现代性在海德格尔那里可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理性主义、效率至上观为核心的现代观念体系；二是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工业体系；三是把一切存在者当作对象乃至质料的现代揭示方式。^①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性的要害在于主体性原则大行其道，技术的本质即所谓的“座架”君临天下：“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这种千篇一律状态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亦即技术的）统治的最可靠的工具。现代的主体性之自由完全消融于与主体性相对应的客体性之中了。”^② 这一理解颠覆了黑格尔—马克思传统对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解。历史不再是通过辩证的自我扬弃而实现的进步过程，而是主体以自我保存为原则而展开的自我否定的毁灭过程。

另一位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未完成的设计。在他看来，现代性观念诞生于18世纪启蒙时代，它努力把现代文化中积累的科学技术、道德—法律和审美艺术的理性潜能释放出来，以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实现社会的合理化。虽然现代性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具有解放潜能的、有待我们去完成的方案。^③ 现代性对物质世界的客观理智态度、对道德和法律的普遍主义意识以及自我实现的人格理想等等规范，并非现代文化的错误观念。民族国家、市场经济、形式民主、大众教育、科层化体系，也不仅是福柯所说的人的规训机器，它们同时还是保障现代物质生活和实现人的自由的条件。海德格尔与

① Michael E. Zimmerman,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Ar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xiii—xxii.

②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21—922页。

③ Jürgen Habermas and Seyla Ben-Habib,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22, Winter 1981, pp. 3.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理解截然不同，但都是深刻和有意义的。从尼采、海德格尔到阿多诺等人对现代性所进行的激进批判，破除了人们对现代性的迷信，让人看到了现代性的危险。而哈贝马斯主要从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角度所理解的现代性，使人认识到现代性的积极和肯定的方面。对现代性正反两方面的认识，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而言，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都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并且都是根据自己的立场，仅从某个维度来理解现代性，而没有意识到现代性在时间维度和全球化空间维度中的运行，及这种运行所产生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

关于现代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性，有两种观念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世纪之交西方学者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此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吸引了人们的眼光，成为解读全球化的重要概念。按照该理论的创立者以色列社会学家 S. N. 艾森斯塔特的观点，“多元现代性”概念指的是一种对待现代世界特征的当代观念，它直接针对的是学术界和一般话语中流行的各种看法，如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现代化理论和工业社会趋同论，甚至更早的马克思、杜克海姆和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对现代世界的分析，因为“它们都假定，尽管只是含蓄地假定，在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那里出现的基本制度格局（constellations）最终将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及现代社会照单全收；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它们将在全世界流行开来”^①。20 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改革似乎强化了这种单一现代性的观点。但是，按照艾森斯塔特的看法，不论是作为解释的方法，还是作为思想立场，这种单一现代性概念都是值得质疑的。艾森斯塔特说：

^① [以] S. N.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6 页。

“出现的现实证明根本不同。所有或大部分社会的实际发展表明，各种各样不同的制度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家庭的领域——持续地呈现出了相对自主的维度……当代的发展并没有证实这种‘趋同’假设，而是突出了现代社会极为丰富的多样性，即使经济发展方面相似的社会，如主要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欧洲社会、美国和日本，也是如此。”^① 艾森斯塔特的结论是：“现代性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的持续的可变性表明，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② 我们生活的世界既不是福山所说的同质化的“历史终结”，也不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而是多元现代性。^③ 原初的现代性是西方的，但是，现代性的全球化不能理解为原初现代性的扩展，而应该理解为在应对和互动中的新文明的形成。当代世界是一个多元现代性的世界，不同的国家虽然共享着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④ 因此，艾森斯塔特明确说：“‘多元现代性’最重要的意义是现代性与西方化并非同一个概念；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本真的’现代性模式，虽然它享有历史的优先性，并继续成为其他现代性的参照物。”^⑤

抽象地说，“多元现代性”概念没有问题，它表达着现代性在全球空间中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法。但是，“多元现代性”所强调的不仅是现代性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modernity），而且是多个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如此一来，现代性这一概念的普遍意义就被

① [以] S. N.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6 页。

② [以] S. N.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4 页。

③ [以] S. N.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9—20 页。

④ S.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vol. 129, no. 1, Winter2000, p. 1.

⑤ S.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vol. 129, no. 1, Winter2000, pp. 2—3.

稀释了。^① 于是，人们不假思索地谈论起欧洲现代性、穆斯林现代性、东亚现代性，乃至中国现代性、日本现代性等。于是现代性概念似乎成了一个空洞的容器，可以盛载现代世界出现的一切社会形态。正因如此，有学者从捍卫现代性公共因素的角度，对“多元现代性”提出了批评：“在西方中心论得到普遍质疑的今天，多元现代性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多元现代性？显然，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认为不同民族与国家的现代性都是特殊的、不可比较的，没有一个可通约的普遍标准，如果有的话，背后就是潜伏的、隐蔽的西方中心主义。另一种思路是承认现代性可以有欧洲的模式、美国的模式、日本的模式、中国的模式，它们都是特殊的现代性，但特殊之中有普遍，多元现代性之间有一些彼此可以通约的普世价值。”^②

与多元现代性理论对现代性所进行的反思不同，西方一些思想家试图从时间维度对现代性的变化做社会学的解释。吉登斯基于人类行为对自身生活环境的反馈性，提出了“反思的现代性”概念：“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个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③ 现代性因此具有了反思性，也就是说，现代性的“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④，从而反思性成为现代性的一种基本特征。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提出，现代性是一个非连续性的动态过程，我们不是处在后现代性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或晚期现代性

① Volker H. Schmidt, "Multiple Modernities or Varieties of Modernity?" *Current Sociology*, vol. 54, no. 1 (January 2006).

② 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1 页。

③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 页。

④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34 页。

(late modernity) 的时代。^① 在吉登斯看来,与早期现代性相比,晚期现代性有三个特征。首先,全球化使早期现代性的时空分离特征更加突出,人们的生活不仅失去了传统的稳熟的生活背景,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媒介的全球化而受到不可见的远距离事件的影响。其次,由于传统伦理生活经验的解体,在高度现代性中,人们日益依赖于抽象知识和专家系统,人与人的信任关系越来越抽象化。最后,随着韦伯所说的社会合理化程度的提高,现代社会制度越来越具有反思性,它控制的对象不仅包括自然的事物和人的生产,而且包括人自身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人的隐秘的私生活。^②

乌尔利希·贝克在类似的方向上提出了“第二现代性”概念,以区别于启蒙时代形成的第一现代性理论。按照他的观点,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生活在自己的活动所产生的风险之中,现代技术和生产网络瓦解了第一现代性中个人、国家与全球之间的固定界限,全球化与个人化已经交织在一起,渗透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所有领域。在第一现代性中,人通过自己的行动作用于世界,而在第二现代性中,被人类改变了的世界反过来又作用于人本身,因此,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被迫卷入非确定性的风险之中。

吉登斯与贝克都认识到,现代性不再是一个可以独立于人们的行为及其结果来定义的固定目标。由于技术和交往关系的变化,现代性后果已经内在进入到现代性的条件之中,我们不能再把现代性的目标与现代性过程做截然的区分。但是,他们的理论本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概念,“反思现代性”、“高度现代性”或“第二现代性”等概念所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技术、文化和人的心理态度的变化。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2、92、143 页。

②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多元现代性”理论和“第二现代性理论”都试图超越传统的单一的线性进化的现代性理论，因而为我们把握现代性的非连续性、多样性提供了思想资源。但是，这些理论都存在着弱点，它们都只把握了现代性复杂性的某些方面，未能对现代性的当代格局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

原初现代性（original modernity）起源于西方。如果我们不是把现代性视为某种事物，而是视为一个“历史的筹划”，视为一个不断展开和进行着的过程，那么我们会看到，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现代性，在穿越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时间和从欧洲到全球的空间之后，在经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和试验之后，在经历了民族国家冲突和战争之后，它再也不能保持其原有的纯粹性和简约性。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空旅行中，现代性已经嵌入到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运动的网络之中，而且现代性也在这种时空旅行中重构、丰富与改变着自身。在当今时代现代性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个各种力量相互斗争的力场，它的任何一个原则、力量、要素在建立自己的霸权时，都会受到其他要素、原则、力量的反制。作为一个历史展开着的过程，现代性的诉求经过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生态保护运动、族群和文化运动等反抗和冲击之后，已经不再能够完全维持其原有定义。

我们认为，现代性问题在当代的呈现形式，既不是“多元现代性”，也不是“第二现代性”，而是容纳“多元现代性”、“第二现代性”所涉及的问题在内的“复杂现代性”。

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复杂现代性”概念的基本立场，是在肯定“现代性”的普遍性、共性和相对确定性的基础上，强调“现代性”在空间、时间和内在结构上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实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肯定它所呈现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普遍趋势的基础上，强调它自身理念

的演化和表达形式的多样化。肯定“现代性”的普遍性、共性和相对确定性是“复杂现代性”概念的前提。即它肯定“现代性”是具有特殊历史定位和特定内涵，具有相对确定的内涵和规定性，它“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理性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①。以现代性规范为例，“现代性”肯定个体主体性、个体尊严、自由、理性、平等、民主、法治等一组可以沿着这个方向拓展的基本价值。“现代性”所肯定的这些价值直接针对的是农耕文明时期所肯定的基本价值，呈现出更能满足人类普遍需要这一人类社会进步的特点。工业文明之所以能够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与这些基本价值在制度、社会运作方式和人的精神气质方面的落实（尽管这一落实是相对的）是直接相关的。期望生产力的这一巨大发展，但却拒斥促使生产力产生这一巨大发展的基本价值，以牺牲一些重要的价值为代价，仅仅追求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不仅必将产生畸形的现代化，而且这种畸形的现代化也必将因其与现代化过程所生成的人的需要相抵牾，而最终窒息自身发展的活力。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选择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建设一种健康的、具有强大活力和长远生命力的现代化，还是选择一种忽略文明发展在器物、制度和观念方面进步的整体性，而只是追求器物文明单方面发展的畸形的现代化。我们只有肯定“现代性”的整体性、普遍性、共性和相对确定性，才能使我们免于堕入相对主义，才能使我们清醒地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把握文明转型的必然性、必要性，并在这一前提下，确定构建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基本方向。

强调“现代性”在空间、时间和内在结构上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实现过程的阶段性和不确定性（包括试错），是“复杂现代性”概念对现代性

^① 参见《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



在经历与不同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演变和当代呈现形态的一种把握。“复杂现代性”概念所指谓的现代性的复杂性包含三个维度。其一是指，在现代性诸多规范的协调性和内在结构的自洽性方面呈现的复杂性；其二是指，现代性在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上的复杂性；其三是指，现代性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发展性，即在其实现过程中它的规范、内在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生成性和所具有的开放性。作为一种“尚未完成的设计”，各种文化都有可能在现代性的实现过程中，对现代性原有的规范作出新的诠释和补充，生成现代性新的理念和新的规范。人类文明的发展，绝不可能是一种既有且固定的模式的推广，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对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经验教训的汲取和反思，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选择更适合自己文化的、在原有传统中可以获得丰厚资源的实现形态，是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我们只有认清现代性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复杂性，才能免于落入绝对主义，才能丢掉全盘接受其他民族的现代性实现方式而使中国完成文明转型的幻想，更切实地根据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文化传统，探索更切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的实现方式，构建一种能够尽可能克服以往现代性的缺陷的、更好（不仅对中国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更好）的现代性。

就当前中国的现实而言，建立复杂现代性理念，在肯定现代性普遍性的前提下，认清现代性规范及其内在结构的复杂性，对于我们历史地审慎地对待以往现代性的理念，从以往现代性过程中汲取教训是一个更为迫切的任务。在人类文明转型中现代性规范的丰富和发展，对现代性规范及其相互协调性的反思从不同的维度展示了现代性的复杂性。

18世纪启蒙思想家试图以个人“自由”观念为核心建立一个法治国家，但是，在此以后，又出现了与个人自由观念相竞争的来自低层人民的“民主”要求和来自工人阶级的“平等”要求，这些价值的出现其最初动机都是要超越现代性的片面形式，以更好地实现现代性的要求，但其结果

却不可逆地铭刻在现代性之中，改写了现代性概念本身。

为了便于理解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我们不妨借助阿玛蒂亚·森对自由、平等和民主问题的相关讨论。他在《以自由看发展》中指出，在现代世界中，没有一种意识形态不承认自由，但是，对自由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这些不同观点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们都是以自由概念本身的某些方面为前提的。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就是意志和行为上不受约束的状态。这种自由当然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用“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质疑和否定之。但是，如果自由不体现为人们实现其目标的能力，那么自由是没有真正意义的。于是出现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观念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自由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在平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同样的困难。在《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中，阿玛蒂亚·森明确说：“对‘什么要平等’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可能成为划分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同伦理理论的基础。”^①关键是何谓平等、何种平等、谁之平等、如何平等？自由主义认为，“平等”就是法律平等或机会平等，而平等主义强调资源平等、需求满足平等或能力实现平等。现代性的规范自身再次出现内在冲突。

在最近的《民主作为普遍价值》^②中，阿玛蒂亚·森再次讨论了民主问题。他认为，虽然民主尚未成为普遍的实践，但在全球舆论氛围中，民主政府现在已经获得了普遍正当的地位。然而，在民主问题上自由主义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是对立的，前者把民主理解为普选权、议会制以及三权分立等法律权利和程序，而社会主义强调民主是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

① [印] 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② Amartya Kumar Sen,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0, no. 3 (July 1999).



自我管理。

如果我们承认自由、平等和民主是现代性的普遍价值，同时又看到，对每一个价值实际上都存在着相互差异甚至冲突的立场，我们就可以理解，现代性理论的核心问题不是所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现代性观念的简单性和复杂性之间对立的问题。

从复杂现代性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问题。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具有复杂现代性思维，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当前社会存在的许多缺陷和问题，恰恰又是由简单现代性思维造成的，如把经济增长当作高于一切的“增长主义”就是如此，它完全不顾社会的复杂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经济、政治、文化是相互依赖的。任何一个方面受到损害，都会妨碍其他目标的实现。有些措施和政策，在某些时候可能是复杂关系的一个纽结，因而是有效的，但在另一时候它可能就成为与其他方面相脱节的简单化做法。

遗憾的是，简单化思维仍然支配着不少中国学者对现代性和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当今学界关于中国的改革和未来发展有各种主义，这些主义或者要求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代议民主；或者要求回到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立场，通过国家来限制市场，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目标；或者要求回到传统文化，建立一个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儒家社会；或以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来实现富国强兵，建立自己主导的世界体系。这些观点并非都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忘记了现代性在规范和制度上的复杂性，而将某一原则、某一制度绝对化，都会陷入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困境。我们认为，中国不论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还是制度的改革上，都需要有复杂现代性意识，一方面保持对现代性规范的内在矛盾和冲突的敏感性，另一方面保持对现代化的经验条件和实践过程的敏感性。